

# 反“和平演变”资料选编

本溪市图书馆编辑

1991.11.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国四十周年讲话中指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会有迂回曲折，这是因为国际反动势力从来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国内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它是国际反动势力实行‘和平演变’的根据，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是关系我们党、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阶级斗争”。如何理解江泽民同志这一论述的精神实质，迎接国内外反动势力对社会主义的挑战，做一个冷静、清醒、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是摆在每一个关心和热爱并决心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面前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历史事实证明，对付敌对势力的武力颠覆，我们是有理论、有办法的，而对付“和平演变”则不然，还需从理论和实践上搞清楚反“和平演变”的问题，在思想上筑起一座坚固的钢铁长城。

为此，市图书馆编印了这本《反“和平演变”资料选编》，共收入文章15篇，篇名索引155条，计6万余字。其目的是为各级领导和理论工作者在进行反“和平演变”的理论研究时，有针对性地提供一些参考文献，从而发挥图书馆在反“和平演变”斗争中的积极作用。

由于时间仓促，~~馆藏有限~~，检索到的文献还不很全面，许多有价值的文章难免挂一漏万，~~即便如此~~，若能~~为~~我市的理论界做点微薄工作，也就感到欣慰了。~~也请同志们提出宝贵的意见。~~

编者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一日

# 目 录

|                                                 |    |
|-------------------------------------------------|----|
| 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                | 1  |
| 中国何以能够受住“和平演变”的考验 .....                         | 9  |
| 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斗争及其历史经验 .....                | 16 |
| 四十年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回顾与思考 .....                          | 21 |
| 从反对和平演变的高度增强党的执政意识 .....                        | 25 |
| 领导者要强化反和平演变意识 .....                             | 27 |
| 关于反“和平演变”问题研究概述 .....                           | 29 |
| 发挥人民军队在反“和平演变”中的重要作用 .....                      | 34 |
| 时代主题与反和平演变 .....                                | 37 |
| “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是当今社会<br>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斗争的主要形式 ..... | 41 |
| “和平演变”战略与经济 .....                               | 44 |
| 试评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新战略 .....                          | 51 |
| 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要领域 ..                 | 54 |
| 论美国对华“和平演变”战略的起源<br>——兼论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      | 55 |
| 西方反动势力“和平演变”的战略特色透析 .....                       | 59 |
| 索 引 .....                                       | 63 |

# 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思想

##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李捷·

1959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杭州一次小范围会议上，首次提出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从那时到现在，三十一年过去了，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左”的和右的曲折，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也是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 一、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课题

在毛泽东之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多次指出无产阶级执政党还会有腐败变质的危险。但是，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却是毛泽东的突出贡献。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思想的提出，不是主观冲动，也不是凭空臆想，而是他多年来对西方帝国主义者和平演变战略进行冷静观察与分析的结果。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经历了一段酝酿过程。1947年5月，美国政府成立以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在制订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时，凯南就提出，在军事遏制的同时，还应当用和平的方法促进某种趋势，“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1949年7月3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向总统杜鲁门递交的信中也提出：“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起，中国终将推翻外来的羁绊。我认为我们应当鼓励在中国的一切发展，这些发展在现在或将来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工作。”

1953年1月，杜勒斯就任美国国务卿。他对和平演变战略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年1月15日，他在国会考虑任命他为国务卿时的证词中提出：“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

达到。”“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他强调要用“精神与心理的力量”达到目的。1956年12月28日，他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发表书面谈话，又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在道义上的攻势”和“在军事上的守势”的两手策略。

1957年4月23日，杜勒斯在纽约发表演说，明确提出和平演变的六项政策，即：一、“提供范例，证明享受自由的幸福”，并且通过我们的情报和文化交流计划，“使全世界都知道这种情况”；二、借助于类似在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苏联干涉匈牙利的做法，“使被分裂或被奴役的国家知道他们并未被遗忘”；三、“决不牺牲他们的利益来解决任何政治问题”；四、“推崇和赞誉那些为自由而流血的烈士”，但是不要鼓动暴力的起义；五、“让苏联的统治者看清，我们要解放的真正目的”是和平和自由；六、“鼓励走向自由的演变”。

1960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后，又使和平演变战略更加完善。1月17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的第10号研究报告。报告明确提出和平演变的两个基本手段，一是“摧毁”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二是西方生活方式的渗透。报告还将东欧和中欧确定为和平演变的突破口，希望“通过东欧来影响苏联内部的演变”。这些都成为西方帝国主义者长期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基本策略。

和平演变战略在50年代后半期提出，绝不是偶然的。1956年发生的波兰“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以及日益明显的东欧国家对苏联控制的离心倾向，使西方政界人士逐渐认识到“共产主义世界已经不再是一块坚硬的独石，而铁幕也不再是无法渗透的铜墙铁壁”。他们为这一发现而庆幸，决意选择“和平取胜”的“高尚战略”来使共产党政权改变颜色。他们甚至设想“竭力发展同共产党阵营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同上层和中层政界人物的广泛接触，以便逐渐影响他们的思想信仰。”

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这些重大变化，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 二、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对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兴衰存亡始终给予特殊的关注。还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经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保持着始终如一的警觉。一提起这个问题，他就有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

如果说，毛泽东在1949年的告诫是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到了50年代后半期，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咄咄逼人之势，他的这种高度警觉便逐渐

形成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思想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防止和平演变问题的提出。

1959年11月在杭州召集的一次小范围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印发杜勒斯的三次演讲，要与会同志认真看一看。11月12日，他又对这三篇演讲作了分析。他说：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比如杜勒斯今年1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词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我们内部起变化。谈到杜勒斯的“和平的转变”思想时，毛泽东又说，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他还特别提到，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的三个材料，是指杜勒斯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上的证词，以及同年1月31日在纽约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讲。尤其是他在1959年1月28日所作的证词中明确提出：“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这番话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谈了这样的意思：这段话是杜勒斯的证词的主旨。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

当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对美国的东西方缓和战略存有幻想。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西方国家提出和平演变战略不久就敏锐地察觉这个问题，是有远见的。

第二阶段，进一步指出和平演变的危险性，并提出“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著作

选读》下册，第822—823页)

他还指出：“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同上书，第833页)

同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对国内阶级斗争的现实形势作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估计，对党内矛盾和意见分歧的估计也明显地脱离实际。但是，他明确提出：“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这句话是值得深思的。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里还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防止和平演变的具体步骤和措施。

第三阶段，关于防止和平演变思想的系统化。

1964年前后，毛泽东再次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提上日程。他考虑问题的重点，一是如何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二是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各级领导蜕化变质。

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正式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7月14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论述：“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他还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即：一、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二、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三、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

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包括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四、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五、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还特别强调，“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这些系统的思想，虽然在某些用语上留下了“左”的痕迹，但是从总体来说，对于我们今天防止和平演变，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965年8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又指出：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在这类问题上，他最担心也谈得最多的，一是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二是防止各级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出现腐败现象。这种担心，并非没有深刻的道理。然而遗憾的是，毛泽东恰恰在这两个问题上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了错误的估量和分析，进而得出所谓中央存在着资产阶级司令部、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等等混淆是非和敌我界限的错误论断，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后果。

毛泽东作为一个勇于不断开拓前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战略家，预见性地提出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兴衰存亡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明确而系统地提出防止和平演变思想，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智慧和胆识，也是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但是，他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时又犯了严重的错误，搞错了对象，混淆了敌我，导致了灾难性后果，这个深刻的教训也值得永远记取。我们必须十分珍视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宝贵思想遗产，又必须认真地剖析他如何从一个本来正确的命题出发却走入歧途而得出错误的结论，牢牢记取在这个问题上的“左”、右两方面教训，妥善地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和问题。

### 三、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

从毛泽东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至今已有三十二年。在这期间，西方帝国主义者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又有许多重大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确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就我们中国来说，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同样充满着艰难与曲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重温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能够得到更多的启迪。

一、无产阶级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也是防止和平演变的关键。这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条重要经验。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以后有没有腐化变质的可能？社会主义制度有没有夭折的

危险？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列宁。他曾经把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文盲、贪污受贿称为苏维埃政权的“三大敌人”。（《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99页）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他还以极大的注意力领导清党工作，努力将旧制度的渣滓和各种投机分子清除出党。（同上书，第147页）他还看到，随着实行租让制，也会带来资本主义习气，“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加以抵制”。（《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77页）实践证明，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风问题的核心是能否保持党的性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问题。应当看到，我们党的本质和主流是好的，但是当前确实存在着某些严重的消极腐败现象。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而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侵蚀，商品经济中某些消极因素的影响，则是最基本的原因。如果我们在从严治党的问题上不下破釜沉舟的决心，而使消极腐败现象继续下去，必将严重妨碍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损害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阻碍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前进。总之，无产阶级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是社会主义基业中最为根本的系统工程。我们必须认真借鉴毛泽东在执政党建设方面所作的认真探索，在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中，总结出从严治党的一整套办法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1963年，毛泽东在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时曾经说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经验是：革命能不能得到发展和胜利，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领导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善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党。只有这样的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才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二、坚定不移地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防止和平演变的根本之计。由于“左”倾思想的长期影响，一提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们往往同“唯生产力论”联系起来。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此长彼消的国际环境下，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问题、发展速度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存亡，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在人民中间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同政治、社会主义建设同社会主义革命，又是密不可分的。列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在实行租让制的时候，他明确指出：“如果认为租让就是和平，那当然是极其错误的。”他在

谈到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时也反复强调，这是资本主义方式同社会主义方式之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竞赛，是两个敌对阶级的斗争的又一形式。不认清这个实质，是非常危险的。（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前言）事实证明，列宁的论断是正确的。西方帝国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往往同时使用着政治的、经济的等各种手段。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政治上的失误，还是经济上的失误，都会给他们提供可乘之机。波兰出现“波兹南事件”以后，肯尼迪就曾说过：“在波兰已经出现了机会，使美国可以采取更大的主动，通过援助、贸易、旅行、新闻事业、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以及我们的资金和技术，去提高波兰人民的生活水平。”“从出现在铁幕上的任何裂缝中培养自由的种子。”

当然，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因此而拒绝同西方先进国家的经济交流和技术引进。恰恰相反，还应继续加强和拓宽对外开放的领域。我们相信，只要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保持清醒头脑，采取行之有效的防范措施，就一定能够在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的同时，博采世界各国之长，把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前进。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用更大的决心和精力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搞好，把国内的事办好。无论发生什么样的突然事件，只要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我们都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励精图治，勤俭建国。

三、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防止和平演变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大量事实证明，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在这个问题上，必须防止两种偏向。既要防止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也要防止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既要防止把社会的一切现象都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也要防止对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现象视而不见。我们决不允许“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重演。同时也还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放松了必要的阶级斗争警惕性，而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其他错误思潮泛滥起来，同样也会发生全国性动乱。面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两方面历史教训，我们必须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从而正确制定防止和平演变的有效措施。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从总体来说是处于逐步消亡的过程中。但是，这个过程将是极其漫长的，而且处理不好还有重新激化的可能。它之所以处在消亡过程中，首先是因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敌对势力的力量和社会基础受到极大的削弱。其次是由于这时的人民民主专政已由以往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变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只要共产党人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就会赢得全体人民的一致拥护。这是人

民民主专政的力量所在。我们不希望出现阶级斗争的重新激化，但这决不是说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们不能麻痹大意，要对阶级斗争重新激化保持注意和警觉。

四、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防止和平演变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毛泽东一贯重视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他说过一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之后，他更把这个问题作为根本之计来看待，一抓到底，毫不放松。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的著名讲话中，他把这个问题看作“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看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当然，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不是没有严重失误。他在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上，也不是完全没有教训值得总结。但是，他在保证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的问题上，给予了始终如一的关注，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毛泽东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论述，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他十分强调在群众实践活动中的长期实际锻炼。他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这段话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它在干部路线上既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又贯穿了历史唯物论，更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领导方法和思想方法。毛泽东的有关论述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必须坚持又红又专的干部标准，决不可偏废。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在这方面，我们同样走过曲折的道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是对毛泽东上述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应当看到，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国际大气候将会长期存在，国内敌对势力也会长期存在。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提高防止和平演变的警觉性，防患于未然。而最根本的还是要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化一切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开拓前进。

《真理的追求》 1991.9.

## 中国何以能经受住 “和平演变”的考验

郭 志 华

帝国主义从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以来，到近一两年达到了高潮。他们的这一战略在东欧得了手，在有的国家得了分，而在中国却碰了壁。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一个问题。帝国主义者当然不会甘心他们在中国的失败，他们必然要吸取教训，窥测方向，继续捣乱下去。这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中国今后能不能继续粉碎“和平演变”的阴谋，永远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为了讨论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我们把已演变的国家与中国在几个主要方面的区别进行比较分析，从中找出该演变与不被演变的根据。

### 历史传统和国情的不同

（一）在同西方的传统联系和受西方的影响方面。东西欧在历史上、文化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有许多共同点。有的东西欧国家原本是同一民族、同一个国家；有的原是一个帝国的组成部分；更多的则是具有相同的文化传统。在地理位置上东西欧联成一片，互相来往很方便。在社会发展上，东西欧基本上是一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直至二战前都属于同一社会形态。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前期发展较顺利，但对西欧影响不大。可是近二三十年来西欧发展较快，东欧却遇到不少困难，加上西欧加紧对东欧的渗透，使资本主义的影响增大了。与东欧不同，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的历史，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历史的大国。中国同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文明没有密切的联系，地理上又相距遥远，因此不易受到西方的影响。中国在解放前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深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之苦，有着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光荣革命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国内外反动统治的伟大胜利。建国后又受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战争威胁、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的逼迫，使我们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与西方国家的来往多了，西方的东西也进来不少。但由于我们党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政策，在积极引进西方对我有利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现代化生产的先进经验的同时，坚决抵制和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生活方式。因此，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是很有限的。

（二）在教会势力和作用方面。天主教在欧洲的很长时期内一直处在很重要的地位。教会的势力很大，信教的人很多。东欧有的国家信天主教的占全国人口的90%，少的也到50%。东欧一些国家的剧变，教会起了很坏的作用，很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就是教会搞的。教堂变成了发表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场所，教会成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庇护所。

中国的天主教虽然来自西方，但是第一，信教的人数很少，教会的势力和影响很小；第二，中国天主教按照宪法的规定，实行独立自主、爱国主义的办教方针而不受罗马教会的干涉和约束；第三，国内反动分子依靠不了教会，教会也不会支持他们的反动活动。

（三）在有无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和影响方面。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源于欧洲，又主要是在欧洲范围内传播。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潮在东欧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欧洲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从它建立到现在正处在兴盛时期。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分化为左中右三派。战后左派成立了共产党，中派和右派联合起来仍称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东欧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二战末期东欧各国在苏联红军帮助下获得解放，成立了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政府，1947年后社会民主党被赶出政府，与此同时或在此前后，共产党与社会党合并为统一的工人政党。当时反对合并的社会民主党人被驱逐出境，流亡到西欧各国，组成流亡者的社会民主党。留在国内参加共产党的原社会民主党人并没有放弃他们所信奉的民主社会主义。一旦形势变化，这些国内外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西欧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互相呼应，兴风作浪直至导致了1989年以来东欧国家的剧变。中国与东欧完全不同。她既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也没有存在过这类政治势力。因此，我们党在历史上没有受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一直是在马列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成长、壮大和取得胜利的。前几年，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也传了进来，并且在极少数人中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很有限，没有多少市场。只要我们认清它反科学社会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本质，深入学习、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它就不可能在中华大地上立足。

####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条件各异

（四）靠自己还是靠别人得到解放。东欧除了个别国家外，都是在二战末期由苏联红军帮助获得解放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没有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出兵东欧，这些国家当时不可能得到解放；当然，没有本国共产党的斗争，也建不起人民政权。然而，决定的因素还是以苏联为主力的反希特勒战争的胜利。这些国家取得革命胜利比较容易固然是好事，但正因为如此它在人民群众中不易扎下根。东欧国家有部分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强加”给他们的。因此，对社会主义社会缺乏亲切感，对社会主义事业缺乏热情和献身精神。与上述国家不同，中国的解放是自己解放自己。中国人民经过80年的旧民主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获得了彻底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革命经历的时间之长，斗争之艰难，牺牲之大是世界革命史上所罕见的。因此，革命的思想、社会主义的信念就能在人民群众中深深扎下根。人民群众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且把保卫、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当成自己的神圣职责。

（五）在不同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是在当时资本主义大工业具有中等或较发达的物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们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水平也比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高。因此，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事业相对来说条件要好些，困难要少些。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如果只看到有利条件而放松了艰苦创业、自力更生精神的培养，就会产生消极的依赖思想，使较好的客观条件不仅不能

充分利用，甚至向相反的方面转化。中国在解放前是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占很小很小的比重，分散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占压倒的优势。国家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很落后，人民中的文盲很多。在这样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低下的水平上搞社会主义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和多方面的阻力。然而，认清这种国情，制定正确的路线、政策和发展战略，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和发挥工人阶级、亿万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性，奋发图强，艰苦创业，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逐步地建立起不断增强的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41年的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今后的发展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六）走不同的道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按照苏联的路子，没收资本家私有财产为社会主义公有而建立起来的。他们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象苏联搞集体化那样彻底，因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较为严重。尤其重要的是没有自上而下地深入发动群众和自下而上地进行群众性的斗争，所以这些国家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程度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而提高。这也是许多群众为什么对社会主义缺乏深厚感情和国内容易出现政治风波、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完全是根据本国国情，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而取得了伟大成功。我们在建国后，把民主革命对象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全部没收变为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把封建地主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在此基础上，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实行了由低到高、逐步改造的政策，使之分别变为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是建立在深入教育和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并随着群众觉悟程度的逐步提高而逐步完成的。这样做确实复杂艰巨，但稳妥扎实，基础牢靠。我国多年来政局的稳定是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分不开的。就是1989年出现的那场动乱和暴乱，也只限于北京和几个大城市，并在全国军民的一致反对下，暴乱很快平息了。

#### 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相佐

（七）是走自己的路还是跟着别人的脚印走。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一十多年前就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必须遵循的，但实际应用这些原理“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列宁也不止一次地说过：一切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走到社会主义，但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这就告诉我们，既不能照抄马、恩、列的书本，更不能照搬别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而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指导下，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不断探索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可是有些社会主义国家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当成了不变的模式，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走；以为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事实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些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些是适应当时特定情况而采取的特殊措施，有些则是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苏联的实际。不加分析地照搬苏联模式和具体做法，并把它当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我国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虽然有过的不少失误（包括教条主义和搬用别国经验），但从整体上讲是局部的和短期的。从50

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我们就开始了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两次曲折,我们终于在80年代初创造出这条道路,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如小平同志所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72页)可见,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不断实践、探索的问题。它既没有现成的答案,也没有适合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统一模式。因此,问题不在于实践和探索中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失误,而在于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敢不敢创造出适合本国情况的建设道路。

(八)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走依靠外援和外援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不把立足点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而是放在依靠外力、外援上,必然是后患无穷。这是一些国家演变为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东欧国家依靠苏联获得了解放,又依靠苏联援助搞社会主义建设。建国后,他们照搬斯大林领导时期的经验,80年代中期又在赫鲁晓夫指挥棒下,大反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则跟着勃列日涅夫搞“全面建设发达社会主义”,实行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和大借外债政策。结果造成经济失衡,消费增长大大超过生产增长,通货膨胀加剧,外债负担沉重,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这些经济上的问题同政治上、思想作风上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就给1989年以来的东欧剧变形成了适合的国内气候。中国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坚持了毛泽东同志强调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了中外反动派而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我们根据中国国情独创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获得成功。我们“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1953年6月毛泽东的一个批示)、建设社会主义。正因为这样,我们不仅顶住了赫鲁晓夫在60年代初的逼合同、撤专家、停援助的压力,而且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建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总结我们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它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斗争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 改革开放的方向原则有引

(九)改革是革除具体体制的弊端还是“改掉”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这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问题。社会主义必须进行改革,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因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有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要求的方面。根据社会主义国家原来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开始时几乎都实行了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必要的。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和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与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旧体制日益暴露出束缚生产力的弊端和阻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因此,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内在要求和自我完善,也是最后战胜资本主义的必经之路。同这种正确认识相反,或是认为不必要改革,因而抵制在本国进行改革和批判别国的改革,或认为改革就是一“乱起炉灶”,“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根本改造

整个社会主义大厦”。这种从维护社会主义体制上的弊端到“改造”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就是某些国家在改革上产生的两种极端。两种极端，同出于一源：思想方法上的绝对化。要么全盘肯定社会主义的一切，要么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的实践历史。两种错误倾向，后一种是主要的。抵毁社会主义的实践历史，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为复辟资本主义大开方便之门。他们把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和以苏联为榜样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官僚专制制度”，是“不人道”、“不民主”的制度；所以要推倒它，实际上就是从科学社会主义滑向民主社会主义制造“理论”根据。这就是一些国家演变或正在动荡的思想根源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十多年来坚定地沿着一条正确的改革道路往前走。我们在改革中也有失误，但它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产生的，它可以而且必然在深化改革中不断加以纠正。因此，我们的改革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从解放到改革前的30年中，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出现过两次大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给社会主义造成很大的损失。即使是这次最严重的错误也不是要不要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在为巩固社会主义的良好动机下，只因对国内形势作了错误估计而发生的。对“文化大革命”当然要否定，但对十年中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的斗争则要充分肯定。综观41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历史，就是不断探索怎样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历史。我们在实践、探索中有错误、有代价、有曲折，但我们始终是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在前进。这就是我们的建设和改革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十）对外开放是坚持还是放弃社会主义的原则。对外开放什么和怎样开放，各国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并不是没有可以遵循的社会主义的原则。凡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本国自力更生的能力，有利于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都应对外开放和交流。反之，则应抵制和反对。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经济上遇到困难，政治上出现麻烦和思想上产生混乱，就急于向西方国家借外债、求援助，寻找摆脱困境的办法，进行无原则的妥协让步。这就给西方国家提供了推行“和平演变”的机会。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经济“援助”、文化“交流”进行政治要挟和思想渗透。他们的经济“援助”为的是诱迫受援国向西方靠拢，从政治上左右你，牵着你走向他们的“自由世界”。而进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为的是把他们的私有化、民主化、多元化等思想观点、价值观念传播到社会主义国家，并使其生根、发展形成一种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势力，最后取代社会主义。这说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被演变为资本主义是与他们在对外开放中失掉社会主义原则有直接的关系的。我国的对外开放，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我们的开放是社会主义的开放，是为巩固壮大社会主义力量服务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开放和更加开放，以便引进对我有利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出口我们能够出口的东西，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抵制不平等的经济、文化来往，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价值观念和腐朽的思想，以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不受侵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对外开放中的两手抓政策，它有力地起到了渗透与反渗透、演变与反演变的积极作用。

## 共产党是否成熟、统一和巩固

### 对国家变不变色具有决定作用

（十一）国家变不变色取决于党变不变质。以上四个方面的不同，都涉及到党的领导是否正确，但更多的还是讲了历史传统和客观条件的差别。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演变为资本主义，中国则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共产党在政治上是否成熟，思想上是否统一和组织上是否巩固。下面就这几个方面作些比较分析。

（十二）坚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是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建立和最后建成的根本前提，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又是实现党的领导根本保证。演变过去的国家其情况虽各有不同，但都是从共产党一味向反动势力作无原则让步、逐步放弃党的领导从开始的。这些党的领导集团中有些人本来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当然不会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有些人虽然是不成熟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由于在领导工作中的错误失去了党内外群众的支持而不能左右局势。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动势力、反对派的进攻下，党的中央自己宣布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而实行西方的多党制、议会民主，接着又将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这样，无产阶级政党就蜕变为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演变成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与上述党截然不同。她在历史上曾有战胜陈独秀的取消主义和王明的投降主义，有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的丰富经验。在长期的斗争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权，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和纯洁性。所以历来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以来，先后撤销两任总书记的职务，就是因为他们关系到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动摇。

（十三）是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和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是党在思想上统不统一的关键。一个党是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主要看它是以什么思想作指导和达到什么目标。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过去和现在执政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等政党，按其党员成分讲不少是由工人组成的。但由于它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者手中，以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所以它“完全是资产阶级政党”。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改名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同时，取消了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和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而将“自由、民主、人权”和“多元论”作为指导思想，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平等、博爱”作为奋斗目标。这样的党已经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变成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的帮办。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始终把马列主义作为自己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把实现共产主义当作最终的奋斗目标。我们历来把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看作是马列主义的胜利；把我们每个阶段上的实践活动，都看成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组成部分和向共产主义目标的接近。我们党在近70年的奋斗中犯过不少错误，但是从来没有怀疑过马列主义的真理性和共产主义必定实现的信念。这样的党，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才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十四）是否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是组织上巩固不巩固的中心环节。党在政治上的成熟、思想上的统一是与党在组织上的巩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前两者是后者的前